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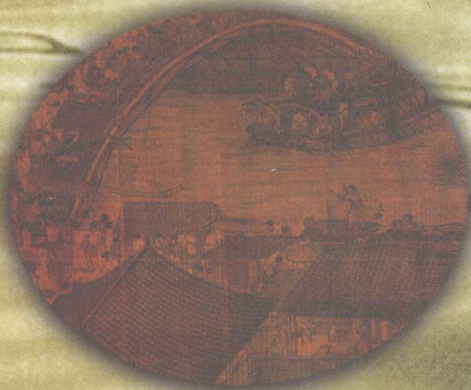
华 / 中 / 师 / 范 / 大 / 学 / 出 / 版 / 基 / 金 / 丛 / 书

漕运与中国社会

CAOYUN YU ZHONGGUO SHEHUI

吴 琦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漕运与中国社会

吴 琦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漕运与中国社会/吴 琦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8

ISBN 7-5622-2037-9/R·26

I. 漕…

II. 吴…

III. 漕运-研究

IV. R5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551 号

漕运与中国社会

© 吴 琦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工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沈继成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甘 英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1999年12月第1版

印数:1—1500册

印张:10.5 字数:274千字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1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题 辞

在中国古代,漕粮京师以保证王朝中央对全国实行统治,是政权存在的物质基础,漕运被视为“天庾正供”,所以“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历来倍受重视。历代史书都有关于漕运的记载,宋唐以来讨论和研究这种制度的不少。今人的研究,则在制度本身之外,注意到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关系。本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把漕运“作为一项社会性极强的经济活动”来研究,全面深入地就漕运与社会的几个重要方面展开了论述,拓宽了漕运研究的领域,在深入具体的阐释中,提出了新的有见地的观点,读者自可从书中见到,不必多言。

本书是吴琦同志较长时间研究的成果。八十年代末,他就开始了经济史的学习和研究,且陆续发表了不少漕运研究的文章。后来,又转攻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学习十分勤奋。在学习和研究方法上,既能认真承继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又能不断吸纳新的理论方法,因而本书的写作,能对“漕运”问题的研究有较大突破。

近几年,我与作者有较多的接触,看到他的日益成长,十分欣慰。并且相信他能在学术园地上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作为与本书及其作者最熟悉的人,愿在此书出版之时写上几句。

熊铁基

1998年9月10日

前 言

任何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是集权政治,在这一政治体制下,滋生了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以维系集权政治的运行与发展。

漕运正是在集权政治下应运而生的一项制度。漕运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社会现象,翻开世界历史,尽管有许多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曾出现政府通过水运的形式调配物质的现象,但是却很难找到如此广泛、持久、大规模的中国漕运现象。

中国漕运始于秦汉,终于晚清,与封建王朝共始终,延续两千多年。中国漕运在封建社会走过了一条明晰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在制度上,从秦汉时期的初创,至唐宋时期的大发展,再到明清时期的完善与烂熟;另一方面,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动向相联系,秦汉时期漕运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唐宋时期发生漕运重心的北南转换,明清时期形成完全以南方为重心的全国性漕运格局。

自秦汉以降,漕运倍受统治者的重视,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王朝的血脉,漕运线成为朝廷的生命线。正因如此,历代王朝在漕运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无数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悉心呵护漕运的正常运行,不断完善漕运制度,不断总结漕运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古代浩繁的文献资料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关于漕运的记载,尤其是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专门记载、总结漕运的卷帙,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清代各朝的钦定户部《漕运全书》,这在世界范围也是绝无仅有的,充分反映了统治者对漕运的重视程度和漕运在中国历史

上的重要地位。

在中国古代社会,漕运起过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首先,漕运最直接的作用就是维护中央政权的稳定。漕粮一直是京城各类成员稳定的粮食来源,历代王朝每年从各有漕地区征运的漕额均达数百万石,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吏役、百姓,无不依赖漕粮。漕运始终是京城安定和政权机关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其次,漕运在中国封建社会发挥了广泛的社会功能,这是一个颇值得今人进行广泛而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关于漕运的社会功能,我们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伴随着漕运制度的发展,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漕运的重要作用,从秦汉时期开始,漕粮便逐渐地被用于军事、社会制衡等领域,成为朝廷发展军事、进行战争以及赈济灾荒、平糶市场的坚强后盾,并且随社会的发展与统治者统治经验的成熟,漕运的这一功能越来越突出,封建社会后期,漕运基本上成为了统治者调控社会的重要工具,漕运的社会性显而易见。与此同步的是,漕运社会功能的另一方面也颇有意义,即漕运对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交流、区域开发等的积极推动作用。漕运的这一功能同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凸现。不过,上述漕运社会功能的两个方面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前者始终是在封建政府控制之下,充分体现了统治者的统治意图,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封建政治体制的作用;后者则是漕运在转输过程中客观上起到的社会作用,是一种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有益于整个社会发展的社会功能。

漕运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和作用和其它行业不可替代的。历代朝野人士无不关注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时至近世,人们仍然重视对漕运历史的考察与研究。抗战期间,民国政府迁渝,西南人口骤增,米价日昂,民食、军食问题严重。40年代初,有学者撰文,

以为“是则先民漕运经验，不乏参考之处”，冀图征田赋于民间，“有运有储”^①。这件事看起来不太现实，但说明漕运确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现代社会，封建漕运已不复存在，但是，河流依然是重要的运输依据，国家仍然有一年一度的大规模的粮食征调，纵横交错的运输需要严密的管理，众多的河流需要治理，河流与运输的关系以及河道运输的社会影响、社会功能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那么，是否可以从历史上有所借鉴呢？

唐代刘晏漕运改革，大刀阔斧地削除旧弊，勇于创新，较合理地调节漕运的运行机制；宋代中央政权有效地利用水道网络，广泛地征集各地财源；明代政府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情况，适时地三次调整漕运方式，提高了漕运效率，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清代则能够通过法规的形式，不断完善漕运制度；清后期，当漕运积弊成疾之时，一些官员大胆地实施漕运改革，体现出强烈的责任心……这些举措虽然都有较大的时代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确是颇富成效的，于国于民于社会都是有利的，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正面的启示。

同时，漕运在许多环节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教训，如漕粮征收中由于官吏的腐败贪婪所激发的农民与官府的矛盾；各级漕运官吏的层层勒索与损公肥私；官府一味地“保水济运”而造成的漕运与农业生产在水利资源上的矛盾；过重的漕粮征收给农民造成的沉重负担以及由此而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等等。这些所谓的“漕弊”是我们社会在处理有关问题时必须引以为戒的。

然而，漕运的社会历史意义并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与中

^① 万国鼎：《明清漕运概要》，载《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

国封建社会的其它部门、行业相比较,史学界对漕运的研究可谓十分薄弱。建国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漕运曾进行了初步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漕运制度的发展概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梳理。建国后,国内对漕运的研究出现了断层,直至70年代末,学术界才重新关注这一问题。80年代以后,人们对各时期的漕运展开了研究,尤其是近几年,有学者开始注意漕运的社会意义,诸如漕运与商品流通,漕运与集权政治的关系等,反映出漕运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李文治、江太新两位先生的《清代漕运》一书,对于清代漕运的研究精深而周全,可谓漕运研究的代表之作,该书的问世,表明漕运研究已向深层拓展,漕运研究将成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多局限于断代漕运,缺乏对漕运的宏观把握和对漕运社会意义的总体研究。

针对漕运的特点及其社会影响,我们研究漕运显然不能囿于陈述历史事实,也不应只从经济史的角度研究,更不能简单地把漕运视为封建社会中的经济负担。社会发展中的任何一项内容都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关键在于审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在于能否从纷繁的现象中提炼出这种社会历史意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路,本书拟从总体上把握漕运的特性及其社会功能,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漕运与封建社会各个领域的关系,力求探索漕运的理论界定,漕运与封建经济的发展,漕运与封建政治,漕运与社会制衡,漕运与人文以及漕运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等一系列问题,发掘漕运与中国社会的内在联系,并通过对漕运的社会意义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与机制。

除了漕运的社会意义之外,笔者在研究中还比较关注漕运的地域性变化。漕运以宋代为分水岭,此前,漕运从经济中心到政治中心一直保持东西方向,此后,漕运从经济中心到政治中心则转变

为南北方向。这个变化与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是同步的，漕运方向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经济格局的变化。而整个变化的过程实际上隋唐时期便已开始，隋代对运河的开凿，唐代对东南财富的仰赖，都昭示南方经济的长足进步和巨大潜力。宋代，南方经济重心的地位确立，宋代政府以汴河为主干水道，大量漕运南方的粮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表明东南地区已经成为朝廷的财富之源。元明清时期，南方经济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领先地位。不过，明清社会又流传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两湖地区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南方的经济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现象在漕运中都得到了全面的反映。研究漕运的区域性变化，无疑有益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深入探讨中国古代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经济重心的南移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漕运时间长——延续整个封建社会乃至（民国以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范围广——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地区都留下过漕运的痕迹，既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发生密切的关系，又极大地影响着上自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时，又紧密地与集权政治联系在一起。所以，本书的研究重心将主要集中在各统一王朝。

目 录

题辞	熊德基 (1)
前言	(1)
一、中国漕运	(1)
(一)“漕运”定义	(1)
(二)漕运生成的历史动因	(4)
(三)漕运的历史演进及阶段特征	(13)
二、漕运与中国政治	(25)
(一)漕粮——“天庾正供”	(25)
(二)漕运的组织管理及吏治:集权社会吏治的缩影	(49)
(三)“中国大政”:漕运改革及其社会意义	(69)
(四)漕运与民间秘密组织	(85)
三、漕运与古代军事	(102)
(一)流动的“长城”——漕运与边防	(102)
(二)“兵以食为命”——漕运与地方驻军	(113)
(三)封建战争的坚强后盾	(118)
四、漕运与社会制衡	(131)
(一)余与赍	(131)
(二)赈济灾荒	(140)

(三) 蠲缓改折·····	(151)
五、漕运与商业经济·····	(161)
(一) 漕运与商品流通·····	(162)
(二) 漕运与商业城镇的兴衰·····	(176)
(三) 漕运与商人·····	(199)
六、漕运与农业经济·····	(211)
(一) 漕运与农业发展·····	(211)
(二) 漕运与古代农业水利·····	(225)
(三) 漕运与小农·····	(241)
七、漕运与社会文化·····	(256)
(一) 漕运与古代科技·····	(256)
(二) 漕运与区域开发——以唐代南方为例·····	(265)
(三) 漕运与人文·····	(271)
余论：漕运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	(282)
附录一：	
清代湖广漕运特点举述·····	(290)
清后期漕运衰亡的综合分析——兼评胡林翼漕运改革 ·····	(304)
附录二：	
主要引用文献·····	(318)
主要参考文献·····	(320)
后 记·····	(322)

一、中国漕运

漕运——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水运形式。这种形式的水运在整个封建社会，曾关联着国计民生，曾被视为朝廷的血脉，备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康有为曾描述漕运的盛况：“自京城之东，远延通州，仓廩连百，高樯栉比，运夫相属，肩背比接。其自通州，至于江淮，通以运河，迢递数千里，闸官闸夫相望，高樯大舸相继，运船以数千计，船丁运夫以数万计，设卫所官数百以守之，各省置粮道坐粮厅以司之，南置漕运总督，北置仓场总督两大臣以统之。其漕米则民纳于县，县上于粮道，乃船通于运河，而后连樯续进，循闸而上，累时费月，乃达通州，搬丁二万人，背置仓中，然后次第运至京师。”^①

漕运的这种形式，以及其规模之大，牵动之广，事务之繁，耗费之巨，延续时间之长，确属中国古代独有。故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对漕运的涵义、漕运的形成与发展、漕运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和梳理。

（一）“漕运”定义

漕运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独特的经济现象，与历代封建王朝（尤其是统一王朝）相始终，是朝廷的重要经济支柱，古代朝野人士

^①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354 页。

曾有过大量的记载和论述。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上的漕运似无一个清晰的认识和估价,或者对漕运的涵义和概念理解过于简单,因此,漕运研究受到了较大的局限,深度和广度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拓展。

漕运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

1. 漕运的字词本意

许慎的《说文解字》诠释:“漕,水转谷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则曰:“车运曰转,水运曰漕。”由此可见,“漕运”一词的本意是指水运,尤指水运谷物。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水上运粮的活动,便有了漕运。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说文约注》“漕”字中按道:“《汉书·赵充国传》:‘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万枚,皆在水次,冰解漕下。’颜注云:‘漕下,出水运木而下也。’是漕之为用,不专于转谷矣。《玉篇》云:‘漕,水转运也。’于义较妥。”确实,漕运“不专于转谷”,历朝历代无不如此。但是,由于漕粮意义越来越重要,故后来“漕运”一词的含义主要指“水转谷”,这也是十分明确的事实。

2. 漕运的原始意义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中国历史上的漕运活动有其特殊的含义,即指封建王朝通过水路将各地的粮食等物运至京城(或其它指定地点),以满足官俸、军饷和皇室消费。所谓漕运的原始意义,实指统治者设置漕运的初衷。这里,有几点需要明确:第一,漕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转谷”或“水转运”,而是特指朝廷的水上转运,即“官家水道之运输”^①;第二,漕运是朝廷通过行政手段自上而下的粮物征调,而非各地自下而上的粮食朝贡,这与先秦时期有着明显的区别;第三,漕运主要是统一封建王朝的粮物征集、调拨与运输,只有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方可确保这种大规模的、有组

^① 杨文煌:《历代漕运评述》,载《中国学报》1944年第12期。

织的常年物质运输,也只有庞大的封建中央政权才需要这种大量的、源源不断的粮食供应。

漕运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历代漕运都是以京城为中心,都是为了满足京城的需要,保证京城用粮的相对稳定。故而,古人将漕粮视为“天庾正供”,一致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漕。应该指出的是,隋唐以前北方的农业生产尚属发达,所产粮食足可维持京城的粮食供应,故而早期封建王朝多就近取粮,而少有隋唐以后那种大规模的“南粮北运”活动。另一方面,隋唐以前军事行动较多,对于粮食的需求甚大,所以早期漕运的军事性质较浓,但这仅是统治者利用漕运加强集权的一种手段,漕运始终是为中央政权服务的。

今人研究漕运多持此义,在概念和研究范围上鲜有突破。

3. 漕运的社会意义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漕运,仅有上面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漕运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粮食运输活动,年复一年地向京城输送官粮等物质。正因为如此,人们历来多注重漕运本身的诸问题,而忽视了与漕运相关联的其它问题和现象。事实上,漕运自产生之日起,便是一项社会性很强的经济活动,触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诸如国家政局的稳定、战争的成败、农业经济的发展、商业经济的繁荣、交通运输的畅达、区域社会的开发、社会生活的安定等等。尤其是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漕运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功能,粮食的运输仅只是漕运的一种形式,漕运实则已经转变为统治者手中的调节器,对社会进行广泛的调控,对于许多不安定的社会因素和失衡的社会现象,统治者都借助和倚重漕运(或漕粮),以达到平息和制衡的目的。此外,漕运还起着一些不属于封建朝廷调控范围、客观上却十分积极的社会作用,诸如促进商品的流通,刺激商业城市的繁荣、促动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加强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等。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漕运、探讨中国古代经济以及其它一些课题时尤应多加注意的问题。

综上所述,漕运的涵义应该是:(1)漕运是封建社会中央政权通过水道强制性转运官粮等物质的一种形式;(2)漕运主要运往京师,以满足京城皇室、官兵及百姓的用粮需求;(3)漕运与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都有密切联系,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

(二)漕运生成的历史动因

漕运制度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并延续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始于秦汉而终于晚清。它是以封建集权政治为母体,以封建自然经济为土壤的封建产儿。

漕运的产生与封建集权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先秦时期,“王”是最高的统治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以“王”为中心的中央政权,实际上仅仅控制着数百里的王畿之地,其余广袤辽阔的地区,则是处于一种“分土而治”的状态之下,或是受封之国,或为臣服之邦。这些大大小小的邦国与中央的臣属关系是十分松弛的,在经济上,主要承担着一种“进贡”的义务,这种进贡虽然是必须的,但却经常是象征性的。因此,三代虽然形式上统一,但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统治,与秦汉时期开始的封建中央集权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可相提并论。及至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列国蜂起,天子独尊的地位动摇并逐渐沦丧,原来形式上的统一和进贡也随之消亡,不复存在。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先秦时期,由于一直没有出现秦汉及其以后的那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统治王朝,故而,也就不存在中央对各地区经济的严密、有效控制和统一调配,不可能出现中央对各地财赋经常性、大规模的征运活动。所以,漕运未能在这

个时期产生。虽然春秋时期,秦国等也曾有过“泛舟之役”^①,但那只是利用水利之便,随需而作、偶而为之的现象,并非制度化、集权下的漕运。

漕运以集权政治为母体。

秦统一六国,开始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对韩非子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②的中央集权理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建立,使一个广袤的地区开始以统一的新姿态出现,统一的集权王朝需要巨量的物质(尤其是粮食)来维持其生存与发展,漕运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封建集权政治之下,影响漕运生成的历史动因,具体而言,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包括皇室)需要巨额粮食供养,以维持其正常运转,发挥政治效能。集权统治不同于其它政治统治形式,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了完全听命于皇权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在京师,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组织。秦汉时期,以三公九卿为中心的官僚组织和军队云集京师,造成了京师物质供应的匮乏。豢养如此众多的人员,除了提供足够数量的土地之外,还必须要有巨大的各项日常实物开支。此外,居住京城的百姓及其他人员也需要大量的日用物质,这些都关系到封建王朝统治中心稳定及其政治效能的正常发挥。解决这一问题,漕运显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漕运实际上是封建王朝中枢机关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无怪乎明季有人大叹:“天下大命,实系于此!”^③与此同时,为了支撑王朝“内兴功作,外攘夷狄”的事业,对付各种内乱外患,完成和巩固统一大业,也必须具有坚强的物质后盾,以巩固自己的力量,维持中

① 《左传》僖公十三年。

② 《韩非子》卷2。

③ 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129《川渚六》,中华书局版。

央集权统治和统一局面。综观秦汉以及其后的历朝历代，漕运与封建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尤其是秦汉之后，这一特征愈加突出。

第二，庞大的封建军事体系需要供养，频繁的军事行动需要充足的粮食作为后盾。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主要边患，大多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所以，自先秦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不断修筑长城，驻守重兵，以防北方强劲势力的南犯，这在集权统治的统一王朝时期均较为典型。由此，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军事防御重心长期处于北方的形势。为了适应、稳定这一形势，一方面统治者将政治统治中心设置北方，形成了绝大部分一统王朝定都北部中国的格局；另一方面，统一王朝无不着力于物质的征调，以保障这一防御体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为此，封建王朝除在沿边屯田外，很大程度上依赖漕运这种粮食输送形式。

边军需要大量粮饷，各地驻军与大小战争同样需要大量粮饷，军用粮草是维持军队生存和保证军事行动的重要因素。秦汉开始，军用粮草主要通过漕运等手段来转输。楚汉之争，萧何功居第一，其中粮草供应及时是其最大的功劳，正所谓“（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①。《汉书·张良传》记载了张良对京师所在之关中的评论：

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

此段论述，实际上反映了漕运在当时的重要作用，“委输”即是指军粮之转运，粮草的运输，直接影响战争的时间、规模、进程，影响军

^① 《汉书》卷39《萧何传》。